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奇主编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历史研究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周淑真 曹木清 曹健民 杨炎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DH29/26 彦奇 主编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历史研究

周淑真 曹木清 著
曹健民 杨炎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周淑真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5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彦奇主编)

ISBN 7-300-11114-4/D · 275

I. 中...

II. 周...

III. ①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研究②中国致公党-历史-研究

③九三学社-历史-研究④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

IV. D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6659 号

中国各民主党派历史研究丛书

彦 奇 主 编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历史研究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周淑真 曹木清 曹健民 杨炎和 著

出版 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75 号 邮编 10087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5.75

1996 年 5 月第 1 版 199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37 000

定价: 7.50 元

目 录

中国民主促进会历史研究

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酝酿和成立	(3)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3)
(二)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6)
(三)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的斗争	(16)
二、积极参加反内战斗争和民主运动	(26)
(一) 组织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26)
(二) “六·二三”反内战大会和“下关惨案”	(31)
(三) 为李、闻烈士举行“人民葬”及《周报》、《民主》周刊 的被查封	(37)
(四) 反对伪国民大会和伪宪法	(39)
(五) 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41)
三、艰苦环境中的斗争	(44)
(一) 纪念“一·二八”抗战，揭露上海“和平运动”	(44)
(二) 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声援学生爱国运动	(45)
(三) 反对国民党当局的迫害	(48)
四、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53)
(一) 否认伪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53)
(二) 响应“五·一”号召，参加新政协运动	(55)
(三) 迎接上海解放和全国胜利	(60)
(四)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65)

中国致公党历史研究

一、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洪门致公堂	(71)
(一) 洪门致公堂的缘起	(71)
(二) 孙中山对洪门致公堂的改造	(74)
(三) 华侨洪门致公堂对祖国辛亥革命的贡献	(76)
二、中国致公党的正式成立及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79)
(一) 中国致公党的正式成立	(79)
(二) 中国致公党对祖国抗日战争的贡献	(82)
(三) 司徒美堂重组洪门政党的尝试和失败	(86)
三、中国致公党总部的重建及其历史方向的根本转变	(92)
(一) 中国致公党历史的重大转折——第三次代表大会	(92)
(二) 中国致公党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推翻蒋介石国民党 集团的斗争	(97)
(三) 中国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积极参加筹 建新中国	(106)

九三学社历史研究

一、九三学社的成立	(115)
(一) 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的建立	(115)
(二) 九三学社的筹备和正式成立	(119)
二、九三学社支持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121)
(一) 九三学社支持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121)
(二) 九三学社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斗争	(123)
三、九三学社积极投入国民党统治区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29)
(一) 九三学社支持抗暴运动	(129)
(二) 九三学社支持反饥饿反内战运动	(132)
(三) 九三学社支持反迫害、争自由运动	(134)

(四) 九三学社支持反美扶日运动·····	(145)
(五) 九三学社迎接解放, 参加人民政协·····	(150)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历史研究

一、抗日战争胜利前后的台湾 ·····	(159)
(一) 日本统治下的台湾·····	(159)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	(161)
(三) 台湾人民争取基本民主权利的斗争与“二·二八”起义·····	(164)
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成立及其纲领 ·····	(167)
三、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后的主要活动 ·····	(171)
四、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 积极参加新政协, 筹建新中国 ·····	(173)
后 记·····	(177)

中国民主促进会

历史研究

一、中国民主促进会的酝酿和成立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形势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我国广大人民群众在受尽日本帝国主义8年侵略战争的苦难煎熬后，迫切希望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民主国家，创造和平安定的环境，以医治战争的创伤，得以休养生息。

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在抗战胜利后的建国总方针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投降之后，即公开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但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并不准备实现人民的愿望。为了继续维护他们的统治，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的军事支持和经济援助，积极准备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内战、独裁、卖国三位一体，是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既定方针，这是与广大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当时，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生死搏斗。蒋介石国民党以反革命的两手对付人民革命力量，在抢夺抗日战争的胜

利果实，积极准备反革命内战的同时，又打出“国家统一”、“和平建国”的旗号，玩弄和谈阴谋，再三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为了争取国内和平，教育广大群众，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与斗争，蒋介石被迫签订了《双十协定》，表面上接受实行民主政治、党派平等和结束国民党“一党训政”等原则，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和各项重要问题。但是，蒋介石国民党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之下，消灭人民军队和解放区。因此，10月13日，《双十协定》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下了和平的伪装，向国民党各部队发出内战的密令，对解放区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

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内战的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在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坚决击退国民党军队进犯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的各民主党派、各界群众分别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或举行反内战集会，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再起。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被蹂躏了8年之久的上海人民，更渴望和平、民主局面的出现。但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到上海的“劫收”，“法币来了，伪币依旧通行，物价日日高涨，人民生活的苦痛……更加厉害”，这不仅给上海人民在经济上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在政治上歧视和压迫上海人民。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宣布投降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就密令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要他防止“市民滋肇事端”，“负责维持地方秩序”。对于汉奸不仅不惩办，反而给了他们很荣耀的官衔。对于人民则当做敌人对待，国民党当局以“收复区复员工作尚未完成者，应视为军事戒严区域”为借口，剥夺了上海人民的言论、新

闻、出版等基本自由权利。国民党当局的种种行径使上海“人民的愤慨到了极度”。他们深切地认识到，蒋介石内战、独裁、卖国的三位一体的政策，是使上海400万同胞和全中国人民重新陷于苦难深渊的根本原因，也是使国家陷于分裂动乱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积极地投入到反内战、反独裁、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爱国民主运动中去。

1945年9月至10月间，唐弢、柯灵主办的《周报》和郑振铎主办的《民主》周刊先后创刊，它们冲破了国民党当局的封禁，代表了上海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周报》发刊词指出：“加强团结，实行民主，这是本刊的使命”^①。《民主》周刊发刊词更指出：“我们是无党无派的中国国民。我们以中国国民的立场来发言。我们是赤手空拳的。我们没有任何方式的政治组织；我们没有任何军队或政党的支持。我们只有几颗赤热的心”。“我们希望：中国在以14年来无数国民的肉血争斗得来的最后胜利之后，能够尽快的进步、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强大、自由、民主的中国，乃是我们所希求”^②。这两个刊物以及稍后创刊的《文萃》、《文汇报》等，给上海人民提供了争取和平民主的舆论阵地，形成了以《周报》和《民主》周刊为中心的一股进步民主力量。

上海各界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在斗争中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组成团体，才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才能更有力地进行斗争。于是，各行各业的工人成立了工会，学生成立了“上海大中学生联谊会”，教师组织了“小学教师联合进修会”、“中等教育研究会”，妇女界、文化界也都成立了各种联谊会、联合会。这些团体组织的建立，推动了上海爱国民主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产生了。

① 《周报》发刊词，1945年9月5日。

② 《民主》周刊发刊词，1945年10月13日。

（二）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立

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原爱麦虞限路（现绍兴路）中国科学社召开了第一次会员大会，正式宣告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都是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民主人士，其基本队伍，是由两部分政治力量组成的。一部分是马叙伦所联系的文化、教育、出版工作者，一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1970年5月4日）字彝初、夷初，浙江省杭县（今余杭县）人。少年时代，曾就读于故乡养正书塾，当时，清朝政府极端腐败，中国在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一步步地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马叙伦深感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产生了强烈的爱国革命思想。临毕业前为同学鸣不平，触怒了学正和监督，被开除出校，于是到上海帮助几家报纸撰文，从事新闻工作。此时，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以及各地革命活动的开展，给他以深刻影响。他参加了柳亚子等发起组织的“南社”，并先后在杭州、江山、诸暨、广州等地任教。1911年夏，马叙伦到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参加了同盟会。随即回国，在浙江响应武昌起义。浙江都督府成立后，他被邀担任都督府秘书。以后又到上海办《大共和日报》，章太炎任社长，他任总编辑。

辛亥革命后，他认为清王朝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可以专心从事教育事业了。1913年，马叙伦到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任国文教员兼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1915年冬，在袁世凯称帝“登极”以前，他毅然辞去北大和医专的职务，离北京回上海，并策动他的学生廖容起兵讨袁，以声援蔡锷率领的“护国军”。

1917年，马叙伦应蔡元培的邀请，再次任北京大学教授。在五四运动中，为支援学生运动，担任北京大学教职员会和北京中

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主席。五四运动以后，北京大中小学教员发起“索薪”运动，马叙伦担任北京小学以上各校教职员会联合会主席，在1921年6月3日率领北京上万名教职员、学生往总统府请愿游行的斗争中，遭到军警的毒打，头部受重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出院后，马叙伦回杭州养病，被浙江省教育厅聘请为浙江第一师范校长，1922年，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厅长。不久，北京政府改组，他即返北京，任教育部次长。

1923年，由于国共两党合作的酝酿，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发展，在北京，国民党员逐渐公开活动，马叙伦被任命为北京市特别市党部的宣传部长。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马叙伦衷心拥护。1924年冬，孙中山为与段祺瑞商谈召开国民会议，扶病北上到京。在孙中山病重那些天，马叙伦参加了轮流守护工作。马叙伦目睹孙中山逝世前后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后，愤然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重任北京大学教授。五卅运动中，他联合各界人士组成“五卅惨案后援会”。1926年，段祺瑞政府血腥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第二天，马叙伦就写了辞职书，愤慨地谴责了段祺瑞，于是遭到段的通缉，被迫化装离开北京回杭州。这时的浙江省长夏超是马叙伦的旧友，马叙伦动员夏超响应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反对军阀孙传芳，又遭到孙的通缉。

1927年，北伐军占领浙江，浙江省政府成立，马叙伦被任命为浙江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民政厅长。1928年底，蒋梦麟担任教育部长，他再次被任命为教育次长。他每天早到晚归，“案无留牍”，仍受到多方刁难，不能有所作为。1929年冬天，他辞职再去北京大学教书。1930年，马叙伦因拒绝重新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华北的侵略，在北京

大学，马叙伦、许德珩、尚仲衣等几位教授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主张抗日，并联络各校主张抗日的教授们，组织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马叙伦被推为主席。

1936 年秋、冬，马叙伦两次到四川，劝说刘湘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应当负起保卫国家的责任，逼蒋抗日。

1937 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事变相继发生，上海沦陷。马叙伦困居上海，贫病交加。为避免敌伪迫害，他改名为邹华孙（邹为其母姓，华孙为中华民族子孙之意），蓄起胡须，专事著述。写成 30 卷 240 余万字的《说文解字六书疏证》，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研究中国文字学的巨著。他曾掩护过一些抗日工作人员，也曾断然拒绝他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的收买。马叙伦这种崇高的民族气节受到了人们的敬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马叙伦同全国人民一样，热切期望祖国成为一个自由、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并名副其实地为世界五强之一。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大搞假民主、真独裁，假和平、真内战，极力维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马叙伦这时虽然已年逾花甲，但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争取的对象。他积极与中共地下党联系，地下党负责同志同他进行谈话后，他毅然投入了爱国民主运动之中。他通过当时上海出版的进步报刊《周报》、《民主》、《文萃》等，发表了大量文章，大声疾呼要求和平民主，严厉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揭露国民党发动和扩大内战的阴谋。马叙伦不仅是《周报》的主要撰稿人，而且是《民主》周刊的编委之一。他同经常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周建人、林汉达、许广平、李平心、严景耀、傅雷等文教界人士发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在原华联银行（现上海西藏南路 26 号）聚会座谈，共商国是，决心为民主政治的实现共同奋斗。

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另一组成部分是王绍鏊所联系的部分上海工商界爱国人士。

王绍鏊(1888年1月9日——1970年3月31日)字却尘,江苏省吴江县人。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名门世家,17岁时中了秀才,并于1908年赴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1911年毕业回国。当时中国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夜,各种革命团体频繁活动,积极从事推翻清政府的尝试。10月10日,武昌起义吹响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号角,随后各省纷纷独立。这时章太炎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以各省联合,建立统一的中华民国相号召。章邀王绍鏊担任联合会交际科主任干事。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王绍鏊陪同章太炎到南京晋见孙中山。1月30日,他因不满同盟会中有人刺杀了陶成章,与章太炎等联合立宪派张謇、熊希龄以及旧官僚程德全等组织统一党,随后应章太炎之邀到达北京。王绍鏊到北京后,才逐渐了解到袁世凯为统一党提供大部分经费、从而使统一党俯首听命于袁的内幕。这事使王绍鏊十分震惊,终于在5月统一党与国民协进会、民社、国民公会等合并为共和党后愤而离京南下,回江苏任省都督府外交代司长。

此时的王绍鏊,虽然对于组织政党感到有些失望,但对资产阶级议会民主政治仍然是热衷的,他积极参加了1912年底国会参、众两院议员的竞选,并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13年春,他躊躇满志,怀着兴奋的心情再次来到北京。随后又被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他曾与宋教仁相约,组织“新进步党”以与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提携合作。3月,宋教仁的被暗杀使王绍鏊进一步看清了袁世凯的阴险毒辣,11月,北洋军阀政府下令撤销国会中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王绍鏊愤而南归。1915年,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王绍鏊积极参加了讨袁运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在段祺

瑞、冯国璋的谋划下，下令恢复国会时，王绍鏊对议会民主政治又心存幻想，于是他第三次来到北京。但是在1917年5月张勋复辟的闹剧中，国会解散，王绍鏊再次逃离北京。8月，他得知孙中山在南方举旗护法后，只身赴粤，出席了国会非常会议，拥护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参加了护法运动。

1923年，北洋军阀曹锟演出贿选总统丑剧，王绍鏊联络江苏籍参、众两院议员20多人，断然拒选，回江苏积极进行反对北洋军阀的活动。当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际，他秘密组织了“新苏公会”，然后又与一些国民党左派人士组成了“苏浙皖三省联合会”，以迎接国民革命军。此事被军阀孙传芳侦知后，遭到通缉。1927年1月，他秘密离开上海到武汉。

在武汉，王绍鏊耳闻目睹了共产党人的许多动人事迹，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的主力作用，产生了进一步了解共产党的强烈愿望。他阅读到了一些马列主义小册子。这些革命理论，使他茅塞顿开。十几年国会议员的坎坷经历和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在中国处处碰壁的严酷事实，使他渴望进一步研究这些理论，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武汉，他还会见了邓演达。随后，通过张群的关系，到南昌会见了他曾一度慕名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两度长谈后，原来的敬慕之情一扫而光。事后王绍鏊对张群说：“两次长谈，进以公的话，不见听；一谈到私利，就立刻有较好的反应，这岂是拨乱反正之人”，并预言：“此人如得志，中国将不可收拾”。说罢拂袖而去，归返上海。

回到上海后，王绍鏊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到横滨桥内山书店买了一大批日文版的马列著作，抱回家中，足不出户，闭门研读。马列主义对社会发展、社会革命的分析和总结吸引住了他。他对马列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斗争的理论尤为折服。蒋介石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从反面教育了他，而马列主义的

真理使他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他认真总结了辛亥革命之后为议会民主政治艰难斗争的经历，认识到“不论向君主专制政府要求君主立宪，还是向封建军阀政府要求民主立宪，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在自传中写道：从此他认识到“要除掉中国社会的病根非彻底革命不可”；“专制魔王蒋介石一天不倒，任何政治的改革，绝没有办法”。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绍鏊在上海参加了各方面人士共同发起组织的“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接着又赶到北平，和蓝公武等人发起组织“救国协会”。1933年春，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为扩大抗日同盟军队伍，冯玉祥亲笔写了30多封密信派王绍鏊到南方各省策动接应，王绍鏊受命匆匆南去，信尚未送完，抗日同盟军却已告失败。王绍鏊陷入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更深刻的思考。

1933年秋，回到上海的王绍鏊与中共地下党发生了联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王绍鏊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他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由于他有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党组织安排他从事对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的联络工作，他以开明人士的身份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他曾到香港、广州策动陈济棠进行抗日，也曾在上海帮助救国会创办进步刊物，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6月，王绍鏊到北方策动阎锡山和冯玉祥的部队加入抗日反蒋的联合行动，在浦口过江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南京监狱囚禁期间，敌人施尽威逼利诱伎俩，他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被释放出狱。

抗日战争时期，王绍鏊曾按照党的指示在苏南地区组织武装抗日小组，并参加了太湖游击队的领导工作。从1941年到抗日战争胜利，王绍鏊先后在香港和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有胆有谋，沉着坚定，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为抗日救国作出了可贵